代表委员热议城镇化

别让农民工成为“都市候鸟”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叶晓楠 张意轩 庞革平

今年两会中，城镇化也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靠什么带动？需要怎样的配套？代表委员们各抒己见，探索城镇化健康发展路径。

新市民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防止“空心化”和“去农村化”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38%，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标志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权益和待遇。

民建中央在提案中提到，对于大城市，既不能关死城门，堵住农民进城，也不能一步放开户籍，让城门大开。对于中等城市，允许有固定职业、在城市工作一定年限者取得城市户口。对于小城市，要向农民打开城门。对于县城和县城中心镇，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代表委员们认为,除了“乐业”外，“安居”同样重要。首先要为农民工提供更加完善的城市基本社会保障。让农民工可以平等享受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优惠政策。为农民工及子女提供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均等的基础性公共服务，让其享有同等的市民待遇。否则,难免会出现“空心化”,使大批农民工成为“候鸟”。

城镇化了是不是就不要农村了？在几个小组讨论上，记者都听到了委员们对消失的村庄的感慨。

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城乡差别缩小了，未来的农民应该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在城镇还是农村。

人大代表、文化部部长蔡武表示，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政协委员、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说，不能片面追求城镇化率，城镇化是个二三十年以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忌讳的是一窝蜂地上投资。

产业支撑很重要

人大代表、湖南耒阳市龙塘镇龙形村村委会主任伍冬兰告诉记者，由于各种原因，相当一部分城镇以农业经济为主，经济结构层次低，无区域特色，农业集约化程度不高，非农产业基础薄弱，就业机会少，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力弱，城镇化发展后劲普遍不足。

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副主任陈振濂表示，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大力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实质上是落后地区经济起飞，实行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而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空间布局，让农村和落后地区能有机会以较低的成本参与到大型的协同价值网络中来，这对于新型城镇化会是一个全新的角度。”陈振濂说。

人大代表、广西百色市市长周异决认为，产业化和城镇化要有机结合，围绕特色产业，发展工业园区。市场配套和龙头企业等，应建在县城或是重点乡镇，既能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又能拉动当地产业的发展。

金融配套要跟上

城镇化的推进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有研究认为未来10年新型城镇化大约需要40万亿元的资金投入。

农工党中央建议，对经济较落后地区逐步引入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多种金融平台机构互相合作形成融资通道。进一步发挥地方金融机构的作用，鼓励并推动其引入民间资本。应采用专业化方案对没有改制的信用社进行改制，发挥其在金融城镇化过程中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政协委员、浦发银行行长朱玉辰认为，城镇化在基础项目上的建设，可以探索收费权质押、土地流转收益和土地经营权质押。加大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的投入，发展移动金融，使用手机银行以弥补金融网点的不足。

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城镇化融资应走市场化道路，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相连接，比如发展债券市场、发行地方债，但前提是地方政府或发债主体必须有“硬预算约束”。

插图：3月9日，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晓光代表（右）举着一个推土机模型说，城镇化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孕育着无限的市场机遇。

本报记者 贺勇 李舸摄影报道

代表委员新面孔

亲身经历让我尤为关注诚信

黄作兴

我是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我认为，诚实守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讲诚信，国家才会繁荣发展，民族才会和谐向上，企业才会蒸蒸日上。所以，这次到北京开两会，我带的7个建议中就有《关于建立全国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议》。

这个建议的提出，更多地源于我曾亲身经历过的一桩突发事件。

2011年4月5日，我在郑州考察项目时，突然接到从温州打来的紧急电话，说集团下属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因巨额债务外逃。我马上赶回温州，在集团总部召开江南皮革公司股东紧急会议。

当时的江南皮革公司有上千员工要发工资，还要支付众多供应商的货款。我任董事长的江南控股集团为江南皮革公司担保1亿元，加上利息共1.26亿元。这笔巨款，如何处置？我对股东们说：“我们集团既然为子公司做了担保，就应该把担保的钱全部还掉。我们企业有诚信才有今天，不能丢掉诚信。因此，我们要给所有员工发工资，需要分流的按新劳动法规定发放失业金，一分不欠。”

次日，老板出逃的消息传开了。黑压压的人群，将公司所在地围得水泄不通。得知此事后，我立即向龙湾区政府作了紧急汇报，采取了有效措施。公司的现场办公室贴出通告：“因公司法人代表逃逸，公司经营发生重大变更被迫停产。公司承诺，将发放在职员工全额工资。”为了缓解困境，我个人向朋友借出400多万元，支付了员工工资。

没想到，这边刚稳下，那边曾为我们贷款的银行却采取了紧急措施，要求立即归还5000万元（2000万元到期，3000万元未到期）贷款。

“诚信比什么都重要。”我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定卖掉在温州市值7200万元的八套跃层楼房。因急于用钱，迫于无奈八套楼房只卖了6000万元，加上免息转让房地产公司10%的股份，获5000万元，又借些钱才凑足1.26亿元，如期全部还给了银行。

于是，公司的3A信用等级保住了，而我在两个江南皮革公司投资的7000多万元打了水漂……但我不后悔。因为诚信，我被评为2011浙江经济年度人物、第二届温州年度财经新闻人物。因为诚信，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使我的企业越做越好。

（本报记者 **袁亚平 鄂平玲** 整理）

链接▶▶▶

黄作兴，江南控股集团总工程师，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系浙江温州市无党派人士联谊会会长。2013年初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我带三个提案上会

冯 俊

作为十二届新任政协委员，我准备了三个提案。三个提案的关键词是：公民教育、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教育界委员，前两个提案均与教育有关，第三个提案则与城镇化话题密切相关，既是解决民生问题，同时又给城市管理者一些新思路。

城镇化最关键的问题是，农民工进城之后如何融入城市？户口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我的切入点是如何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紧扣热点，将教育与城镇化结合起来看，也是事关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

我是农民的孩子，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后来又到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我的人生一直与改革开放同步，也是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学里学习工作了31年，也教过许许多多的农民的孩子。2008年从人民大学调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做干部培训工作，但是农业、农村、农民仍然是我关注的问题。

由于当前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义务教育资源的配给制度的局限性，在某些地区,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为此,我提出了四点对策建议:坚持教育以人为本,在义务教育阶段,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包括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内的每个适龄儿童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健全教育投入制度,建立教育经费政府间分担机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探索借鉴美国“教育券”、“流动教育计划”(MEP)等制度的可能性;探索实行“义务教育登记卡”制度。

至于“加强公民教育，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提案，则来自于我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我认为国家应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全覆盖的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课程体系，加强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监督实施和检查考核，建议在就业招聘考试、公务员考试、干部教育和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中增加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

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是摆在城市领导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建议国家要有顶层设计，统一标准，打破地区分割和部门壁垒，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突出重点，关注民生，防止一哄而起，造成新的浪费。

（本报记者 **张永恒**整理）

链接▶▶▶

冯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哲学教授，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要讲真话、讲良心话”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我是一位新委员，我想还是要讲真话，讲良心话。”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分组讨论会上，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胡刚委员的发言直指教育领域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建议要“改善工作作风，为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进真话、讲实话”是记者听到的委员讨论发言中的高频词，也已成为委员们的共识。

“下面的发言，我讲得大胆了一点。在座的院士，我可能要得罪大家。”政协科协界别分组讨论会上，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张勤委员的“得罪”一说确有原由。

一是科协界别院士比例高，二是张勤的话题和院士有关：“我想说的和如何评上院士有关。”

“现在，我们的院士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而是变成一个单位的事情，成了单位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讲到这里，张勤顿了一下，“院士变成单位的利益所在，最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单位开始动员所有的力量来包装本单位的被推荐人。”

张勤坦言，这一包装“就容易出问题”。他直言“应该取消政府和单位推荐院士”。

吴国平代表：“调薪”更要“调心”

本报记者 **叶晓楠**

“当下，无论是乱扔垃圾事件，还是中国游客在国外一系列‘出洋相’事件，无不与国民素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以制度化以及其他相应途径，加强传统文化礼仪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与现代法律法规相辅相成，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化风导俗的特殊作用。”江苏省无锡灵山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平代表说。

“与30年前相比，我们不论住房条件、收入水平、生活质量，都提高了许多，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抱怨?”吴国平这样发问。

他认为，正是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不正确的价值观，导致了焦虑症候群与日俱增。因此，既要提高国民生活品质，也要提高国人的心理素质。“我们正处在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其中，心态问题有很重要的影响。”

古人有云：“屋宽不如心宽，身安不如心安。”吴国平指出，当前，我们不仅要“调薪”，更要“调心”。

两会行走

许罗德代表：加大对消费金融的支持

本报记者 **梁益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银联总裁许罗德在参加两会时说，十八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要求我们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他认为，消费金融在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方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消费金融针对居民消费需求提供的信贷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提高社会总消费水平。国内消费金融典型工具——银行卡的发展有效证明了这一点，根据中国银联测算，2012年我国银行卡的使用拉动全国居民消费增长1.15%，进而带动我国GDP增长了约0.44%。

许罗德建议，借鉴国外消费金融成熟市场实践经验，加大对消费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和相关机构，加快拓展消费金融业务，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最终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与转型。